

推动构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三大体系”

——第三届新时代史学理论论坛综述

宋 儒

2023年8月30—31日,第三届新时代史学理论论坛在吉林长春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中国历史理论构建”,旨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加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以下简称“三大体系”)建设等问题开展学术探讨、凝聚理论共识。论坛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承办,来自全国三十多家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应邀与会。

论坛共设两场主旨演讲,四场分论坛讨论,58位学者分别就“新时代的中国史学”“中外重要历史理论问题”“‘四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中外史学史研究”等议题作了报告。参会学者中既有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又有崭露头角的学术新锐,展现了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薪火相传、欣欣向荣的良好局面。总体而言,本届论坛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凝聚建设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的学术共识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历史理论研究区别于其他历史理论研究的本质属性和显著标识。本届论坛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重要学说和基本概念,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和学术传统作了深入辨析和充分回顾。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南开大学教授乔治忠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学说的形成和演进过程,廓清了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正确涵义和理解途径。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赵庆云梳理和辨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中“生产力”概念的发展变化。还有学者将研究视野聚焦于近代以来我国史学和史家的成长历程。武汉大学教授谢贵安认为,不能忽视传统史学在近代史学转型中的作用,在西方史学东渐的时代大潮下,中国史家总能在浩瀚的传统文献和学术思想中,找到与之对应的近代因素,建立起以中国本土史学为主体的近代史学话语体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徐国利指出,侯外庐“谨守考证辨伪”的学术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指导,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实证与义理、求真与致用相结合的中国史学“大传统”,为传统考据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新范式。淮北师范大学教授李勇、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姚征、淮北师范大学讲师武晓兵集中探讨了吕振羽的史学思想和实践。李勇认为,在第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吕振羽较早使用神话系统研究中国史前史,他不仅论述神话传说对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性和使用神话研究古史的正当性,而且提出了把神话传说与出土文物互证,从而考察两者在内容、流传或出土

区域是否相符合的具体方法。姚征提出,吕振羽在研究传统思想文化时运用唯物史观,结合时代变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实际,从各阶级、各阶层及各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探求意识形态斗争的演变和发展。武晓兵回顾了新时代以来学界在吕振羽的生平活动与人际网络、精神风范与学术遗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比较研究等多个方面的学术进展。国防大学副教授李雷波立足近代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历史背景,回顾了彼时学界编纂“中国通史”的探索,认为在此过程中,邓之诚最终确立了自己的写作规范与基本宗旨,成就了独特的通史观。苏州大学副教授侯德仁回顾了柴德赓的唯物史观转向历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储著武认为,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历史问题委员会对于解决中国历史研究的方针和任务等问题起了促进作用。

回顾历史的目的是启迪未来。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指导下,着眼于建设新时代中国史学“三大体系”,吉林大学教授王广义指出,以自主的知识体系建设中国特色历史学,有利于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供学理支撑和历史智慧。历史学工作者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实际,坚持大历史观与正确党史观,统筹推进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扬州大学教授李文才以黎虎《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为例,提出掌握史学话语权的根本性、首要性依据是构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史学话语体系。这个史学话语体系从基础性史料,到用来表述理论或概念的语言词汇,都必须是中国而不能是“舶来”的,对于那些准确反映和表达中国历史实际的本土固有词语概念,必须毫不犹豫地加以运用。这是构建中国本土史学话语体系、掌握史学话语权的重要先决性条件。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全荣指出,新时代要注重古籍文献的保护、整理和研究,揭示古籍文献中蕴含的精神内涵,以古籍文献研究促进文化传承;还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古籍文献“图形检索”功能,建立资料齐全的古籍文献数据平台,使古籍文献顺应时代发展,响应时代发展要求。

关于中国史学诸学科和研究方向的未来进路,也有不少学者作了探讨。关于世界史、全球史学科,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汪朝光从新中国成立后编修的三部具有代表性的世界史著作入手,认为三部书的深度各有千秋,但均未取得突破。他强调,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需要处理好通史研究与专题研究的关系、研究主体性与世界观照的关系,把握好世界历史发展的主线与支流、原创论题与阐释论题,注意跨学科研究与科技运用,坚持以史为鉴,推动世界史与中国史学科的融合发展。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曹小文认为,21世纪以来的全球史研究因契合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文化需求,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中国全球史研究主体意识的觉醒,正在由无意识的盲目发展转为有意识的主动作为。关于深具学术传统的政治史研究,临沂大学教授李宜春认为,在近现代政治变迁的过程中,历史政治制度学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他结合自身研究实践,认为内辅体制、统筹体制、差遣体制、当下统筹型行政体制的逻辑框架、差遣驱动型的监察体制与行政体制变迁、直属体制与行政区划体制变迁、正副职与领导层制度等问题互有包涵、逐步深化,其中一些新的核心概念已经初具体系性,应引起有关学者的专注。关于其他新兴研究领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周琼、广西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薛辉分别指出,历史分期是环境史学的根本任务之一,中国环境史可分为自然演替期、传统经济开发及破坏期、近现代工业破坏及危机爆发期、当代环境保护及治理期等四个时期;应全面系统回顾和总结中国环境史学各领域的进展和特色,充分继承传统优秀学风,汲取经典研究成果的丰富营养。西北大学副教授陈跃提出,中国边疆学建设应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以“三大体系”建设为突破口,吸收中国传统边疆史地研究优秀理论与方法。中国历史研究

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建斌回顾了西方治理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提出深化国家治理史研究应当探索事关国家治理理论和实践逻辑的重大理论问题,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博士后苑苑认为,犯罪史是法制史研究中一条另辟的蹊径,综合考察政治、社会、文化各要素,是深化历史时期犯罪认识的必由之路。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侯潇洁关注数字史学的兴起,提出数字史学不是计量史学的简单延伸;面对数字史学带来的史料真实性、数据可靠性、持续访问与永久保存等问题,历史学家应重视“历史”的本体位置,辩证看待“数字”的方法作用。此外,山东大学副教授孔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清朝历史地位的学术讨论,认为应从清朝在中国历史中的角色、清代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等多维视角切入,以充分揭示清朝历史的多元性、丰富性和复杂性。黑龙江大学副教授綦岩总结了新时代黑龙江史学研究的新特征。

新时代的中国史学理应具备世界眼光。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张作成、副教授李根,天津师范大学讲师胡宇哲介绍了海外史学研究中的新情况、新动向,有助于深化中外史学的比较互鉴。张作成指出,当代社会的巨变要求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发生变化,因此学界需要一种预见性的历史思维和想象,为地方与全球范围内可能发生的灾难做好必要准备。李根以卡洛·金兹伯格的微观史书写为例,提出金氏微观史的叙事“如实性”是通过削弱作者的叙事权威性、多视角的“复调”叙事及强化读者自主思考的方式实现的;在史料海量、影音化和自媒体化的趋势下,他的写史策略将大有用武之地。胡宇哲追索美国史学界关于种族问题的长期论争过程,从史学理论的角度分析当前美国学界关于“1619项目”的争论,指出这场争论反映史学与现实之间互相勾连的复杂情况,以及美国因身份政治所产生的社会撕裂现状。

二、系统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本届论坛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积极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多位学者对此作了深入思考。围绕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中概括出“炎黄—华夏—中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演变轨迹,强调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的最本质特征是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李大龙指出,在“整体性”视角下,“中国”和“边疆”共同构成了“天下”,并不存在谁加入谁的问题。吉林大学教授马卫东认为,西周开创了中国大一统历史的先河,深刻塑造了中国以大一统为导向的政治模式与文化传统。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中,西周封建大一统具有划时代的创新意义。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松筠从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三个层面分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形成机制,提出正是这“三大认同”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并推动中华民族完成了由“自在发展”到“自觉发展”的飞跃。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理念、实践和元素,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曲柄睿提出,在中国古代早期历史中,学习是儒家的核心属性。学习可以帮助人积累知识,促进形成判断力;磨砺性情,达到圣人的境界。是否提倡学习,表面上看是一种认识论的问题,深层次看是人性论的问题。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常文相评析了黄宗羲的民本思想,认为黄氏所撰《明夷待访录》反思明亡原因,总结施政教训,阐发了以抑制君主私权、伸张天下公权为核心的一系列政治、社会诉求,展现出鲜明的“民本”观念,至今依然彰显重要的时代意义。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程源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吴圣武对中国古代的优秀治史传统作了考察。程源源提出,吕祖谦的《左传》阐释呈现经史并重之特点,与其以经学作为伦理道德标准以正人心,以过往史事为现实提供借鉴的致用观密不可分。这一治学风格发端了浙东学术“言性命必究于史”的学术传统。吴圣武发现,正统论是影响史书编纂的重要观念。明代是历史上正统之辩的高潮时期之一,激烈的正统讨论与明人的历史认识紧密结合,推动了明代不少前朝史著述的撰写,这是明代史学中值得关注的现象。此外,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孟繁勇分析了清代东北地区封禁政策这一传统治理实践的变迁。

在“古今中西”的宽广视野和比较维度中深化对中华文化转型和嬗变的认识,是本届论坛的学术特色。东北师范大学教授赵轶峰回顾了柯林伍德与刘家关于中西方历史理性问题的理论观点,认为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是两种相互差异的认知观念和路径,二者具有共同的理性基础,其相互结合拓宽了人类知识发展的道路。在东西方文明互鉴的视角下讨论东西方历史思维的差异,并不是刻意强调东西方文明的差异,而是寻求互补之道。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陈立柱认为,应在“中西马”的综合视角中审视文明起源问题。就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在具体领域中的纠葛互动,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庄新关注19世纪中前期的中外知识交流,认为媒介版式、印刷技术、传播网络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了海外汉学期刊传播中国知识的物质性基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蒋重跃总结了20世纪初启蒙理性在中国的传播特征,认为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最为壮观的一次思想热潮,它在开启智慧上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但其负面效应也表现得非常突出。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谭星分析了民国时期“中国农村派”与“乡村建设派”的论争,认为“乡村建设派”从救济文化失调着手,试图通过改造文化实现民族自救,“中国农村派”则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指出了“乡村建设派”的理论缺陷。

还有学者以强烈的现实关怀,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出了学术意见。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左玉河指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质是要完成近代以来未竟的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任务和中华文明现代复兴使命,实现中华文明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具有“中华民族”突出特性的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发展形态,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度发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刘仓分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辩证关系,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和魂。“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髓,体现了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精华。人类文明新形态赓续着中华民族精神血脉,中国式现代化包含的思想内核、思维方式和话语概念,都体现了中华优秀文化的踵事增华和与时俱进。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展龙提出“治理文明”问题,呼吁正确认识历代国家治理的文明程度,深刻把握历代国家治理的发展规律。

三、以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为指导,扎实推进新时代“四史”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下简称“四史”)的学习、宣传和研究。同时,在新的治国理政实践中,一系列新的重大创新理论

成果相继问世,为深化“四史”研究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方向指引和理论遵循。新时代的历史理论研究,应当把“四史”作为重要研究内容,实现同“四史”理论和方法的有机融会,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为深入把握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大势、纠治各类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潮贡献理论力量。

不少学者对新时代以来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给予了学理阐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柴尚金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两个重大理论命题,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凸显了人类文明形态新特质,创新了全球现代化理论,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南昌师范学院教授张艳国认为,历史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发展进步的阶梯,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活力的文化资源。重视历史、研究历史、传承历史,运用历史智慧开创未来,既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要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学风。因此,我们要坚定历史自信、提升历史自觉、增强历史主动。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徐志民揭示了国霸必衰、反霸必胜的历史逻辑。他强调,霸权主义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产物,严重阻碍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霸权主义不得人心,必将陷入国霸必衰的历史定律。新中国成立后的反霸历史与经验,为新时代反对霸权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坚定反对霸权主义的历史自觉,把握反对霸权主义的历史主动,增强反霸必胜的历史自信。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刘春子、江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肖春重点论述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刘春子认为,要洞察历史发展大势,在历史自觉中践行“两个维护”。肖春指出,“两个确立”是将党的历史意识、历史思维和历史理论深深植根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一百七十多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百年中共党史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当代变革史作出的深刻总结,是党将历史经验运用于进行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伟大斗争之中,实现伟大梦想,向当代世界所作的庄重昭示。另外,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冯立基于近期热映的电影《封神》,指出神话题材历史剧同样需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一要注重还原历史细节,方便观众准确把握影片的历史背景及其所属时代的文化特色;二要以恰当的方式还原历史情境,捕捉历史的脉搏和气息,描摹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人心;三要为社会发掘值得颂扬的历史精神。

还有学者对如何运用新的理论、观点和视角深化新时代“四史”研究作了思考。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宋学勤指出,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大历史观视之,在引发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动力中,中国共产党是主要的动力之源,在社会变迁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要拓展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研究视野,在“社会”中重新理解政治,在感知“社会变迁”的同时,还要感悟“何以变迁”,克服“思想不在场”的弊病,从思想层面回应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王锐发现,近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兴起了讨论“历史政治学”的热潮。将“历史政治学”运用于中共党史研究之中,需要深入思考何谓“政治”、何谓“历史”、理想状态下的“历史政治学”应是怎样的。他提出,应加强对中国近代史整体脉络的全面把握,同时兼具世界近代史视野,从基本史实出发,思考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持续影响中国发展、并适合用“历史政治学”来展开研究的关键议题。华东交通大学教授甘润远引进“正负反馈耦合原理”,强调社会系统的长期演化过程,正是正反馈作用与负反馈作用的有机耦合、交替主导和往复循环。循此思路,他认为,分别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安徽农村改革使中国社会系统沿着不同的方向演化变迁,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造成了不同影响。中南大学副教授黄令坦则通过对毛泽东史学思想的回顾和提炼,为新时代的

“四史”研究提供经验借鉴。他指出,毛泽东史学思想具有五个突出特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科学概括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系统而全面的理论体系;辩证思维深入贯穿其中;深刻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史学精髓。

同时,针对“四史”研究中引发关注和讨论的具体理论和现实问题,也有学者提出了新的见解。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韩东育由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理念和政治意蕴展开讨论,认为纪念碑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深刻的历史观。人民英雄纪念碑抒发了中国人民的抗争精神,具有鲜明的人民性、民族性,其碑文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人走出深渊、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恢复民族自尊和自信连续历史过程。辽宁大学教授焦润明着眼于新中国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的塑造,认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使广大工人能够自觉投身于中国式工业现代化建设中。新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意识,主要表现为爱国、爱厂的敬业精神,集体主义和甘于奉献精神,自力更生与钻研创新精神,以及不甘居人后的赶超精神。这些精神成为中国式工业现代化的内生动力,找到了一条有别于西方工业现代化的新发展路径。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博士后卢晓娜从延安时期美国观察家的视角出发,回应了海内外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误解和偏见。她指出,美国观察家的记录清晰表明,党的革命逻辑具有独立自决、守正创新的特性。抗战时期,党正是在此革命逻辑的引领下,立足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扎根时代背景与民族土壤,积极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自我意识,庄严宣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自我主张,马克思主义因而具有了灵活生动的中国面貌。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宋儒梳理和辨析了一个时期以来在土改认识和评价上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他指出,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中国农村地权结构、阶级关系和农民生存状况的调查分析,旨在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关系、解放农村社会生产力的系统性社会变革。

总之,本届论坛坚持正确的历史观,致力于在“大历史”、长时段中研究问题,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社会和学术思潮,重视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阐释,丰富了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的建设思路,拓展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认识路径,增强了“四史”研究的政治自觉和理论自觉,视野宏大、观点鲜明、论证翔实,展现了鲜明的问题意识、深切的理论关怀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发出了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把握历史大势、探究历史规律、纠治错误思潮的学术正声,具有较高的政治站位和学术品位,有力推进了新时代中国历史理论研究的创新发展。

(作者宋儒,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邮编:100101)

(责任编辑:敖凯)

(责任校对:尹媛萍)